

年选
大系

2003 ZHONGGUO NIANDU ZUIJIA
SUIBI

2003

中国年度最佳

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随 笔



年选
大系

2003 ZHONGGUO NIANDU ZUIJIA
SUIBI

2003

中国年度最佳

随笔

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3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杜渐坤,陈寿英选编.一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4.2

(2003 年选系列)

ISBN 7-5407-3109-5

I .2... II .①杜...②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4369 号

2003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

编者◎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

责任编辑◎汪正球

封面设计◎罗 云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桂林漓江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453 千字

印张◎15.25

版次◎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407-3109-5/I·1894

定价◎24.0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编者的话

以广泛选收具有思想文化内涵的,带有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性质的,能见出作家学人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说精神的“年度最佳随笔”选本,到这一年,已是第五本了。前四本据说反映颇佳,每本行销均在二万册以上。在许多书籍滞销的情势下,选本能有此印数,当然是我们高兴的。编选者何求,无非是想以自己仅有的一点眼光和识力,选出一些自以为好的作品,推介给读者吧。

在这里,言明“自以为好”是必要的。因为文学作品这东西,从来就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定其优劣,哪怕是什么权威或什么权威机构。何况是人们的思想和审美意趣都在不断变化的现在,又何况是某些特有独立见解“放言少忌”的篇章。

因此,我们也不敢奢望这一本是人人皆会首肯的什么“最佳选本”,尽管整套丛书以“最佳”名;只希望它对读者在思想上,学养上,乃至艺术审美意趣上有所裨益。此外呢,就是能给今人和后人,留下某些葆有社会、历史、文化责任感和道义良知的作家学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思考轨迹吧。

被裹挟在、困扰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不仅国家在变,世界在变,就连人类惟一赖以生存的我们这个小小地球也在变

的时代的某些作家学人,他们的思考轨迹,有许多无疑是蕴涵着对时代、国家乃至人类生命群体的大关怀大忧患的。

杜渐坤 陈寿英

2003 年岁末于广州

目 录

编者的话	杜渐坤 陈寿英 (1)
重读玻恩：人类的希望何在	吴小龙 (1)
人类距离动物究竟有多远?	万 方 (11)
思想和创造可以替代吗?!	
——兼读林德宏的《人与机器》	丁 帆 (30)
保护“诺亚方舟”	詹克明 (38)
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外一篇）	冯骥才 (48)
“调人”的隔膜与历史的迷雾	张 鸣 (54)
不可逃避的沉重阅读	
——初读胡风“三十万言书”全文	邵燕祥 (62)
江上春归	
——写在陈独秀逝世 60 周年	袁 鹰 (77)
“独怜风雪夜归人”	钱理群 (86)
读《我和艾青的故事》	杜渐坤 (93)
编辑家巴金	阎 纲 (98)
鲁迅，为巴金挡住风沙	李 辉 (104)
向鲁迅学习爱	王 干 (112)

七十年前的“梦想”

- 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 傅国涌 (115)
- 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 傅国涌 (125)

“接班人”的忧思和痛切

- 毛泽东与《三垂冈》诗的感情共鸣探秘 彭明道 (132)

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

- 《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序言 李 锐 (144)
- 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 葛兆光 (152)
- 得一佳句足矣！ 吴 江 (160)

- 什么《英雄》 潘旭澜 (163)

- 由溥仪旧居想起伪满皇宫 何满子 (171)

- 精神现象拾零 陈四益 (175)

如此照相

- 往事忆拾之三 顾 骧 (183)
- 随笔三则 洁 泯 (187)
- 说 犬 白 桦 (192)
- 说“士节” 王学泰 (196)
- 沉默的墙 梁晓声 (206)
- 钻石并不恒久 韩小蕙 (213)
- 书内书外的札记 叶延滨 (219)

- 天风吹我不能立 李国文 (226)

- “八艳”的脂粉 山 谷 (237)

- 孔子：一个比烟花寂寞的人 张大威 (243)

- 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 高建群 (248)

看那个野性勃发的王朝!

——《郑和》溅起的猜想 朱苏进 (259)

天才之境 红 柯 (269)

秋草独寻人去后

——绝句之旅 李元洛 (274)

小品和大师

——读苏东坡的小品 赵丽宏 (281)

海 魂 王开林 (287)

驯 心 王充闾 (295)

血 酬

——打造横规矩的故事 吴 思 (310)

士大夫与女人的缠足 陈玉明 (325)

剃发·蓄辫·剪辫子

——关于辫子的历史 王晓天 (334)

玉米与明清的移民开发 陈亚平 (343)

移民与村落 贾兴安 (348)

古典之殇 王开岭 (353)

视野的盛宴 张承志 (360)

重读那轮月 毛志成 (365)

西厢与书信 仇润喜 (370)

菖蒲花·长安记 车前子 (376)

因一种植物而怀想 王剑冰 (383)

美女难画否 舒 展 (387)

花落知多少 永 宁 (393)

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有免费的历史教训

- 谈谈前苏联把农村当殖民地对待的致命错误 ... 严 秀 (400)
- 尴尬的高尔基 牧 惠 (416)
- 托洛茨基的余影 孙 郁 (421)
- 时代弄潮儿西蒙诺夫 蓝英年 (427)
- 朱可夫雕像 朱增泉 (448)
- 我们为什么特别喜爱老柴 肖复兴 (462)
-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林 非 (469)
- 走近爱因斯坦
- 读《爱因斯坦语录》 冀 沅 (474)

重读玻恩：人类的希望何在

吴小龙

不久前，拉兹洛的《巨变》一书的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本出版于“九一一事件”之后的书预言了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世界将要发生巨变，而在“九一一”后的世界氛围中，我们很难指望这种预言指出的是一种美好的前景。有别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托夫勒那令人振奋的“第三次浪潮”，拉兹洛这次预言的是令人忧惧的“第五次浪潮”；人类在二十世纪已经经历过布尔什维克革命、法西斯泛滥、非殖民化浪潮、改革和公开性这样四次浪潮，它们基本上都是社会政治领域里的动荡，无论曾经付出了怎样的铁与血的代价，总算都已经过去了；而在这些政治动荡过去后，世界却没有迎来人们所期待的太平。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我们现在所要迎来的新一轮浪潮，却居然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本身带来的困境！那就是：全球性的人口爆炸及其相关的人口老龄化、城市化、移民和难民问题；贫困化和大规模的饥谨；各种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原因造成的局势紧张，及其所导致的军备竞赛升级和资源耗费；还有环境问题——环境污染、土地侵蚀、酸雨、气候变暖；森林、草原、湿地破坏导致的物种和生态危机，食物缺乏、能源枯竭，以及所有这些因素的交织影响造成的恶性循环等等。这个已然汹汹而来的“第五次浪潮”几乎是一种让人心烦意乱、不知所措的四面楚歌：因为所有这些问题的纠结太繁、太紧，几乎找不到可以砍断这恶性循环链条的最适当的环节。于是，拉兹洛把这称为全球系统爆发前夕的、突变的“临界状态”，就是说，由于危机的积累，我们这个遵循“复杂巨系统”进化的“非线性混沌动力学”规律的地球系统已将进入它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奠基时期，

从一八六〇年到一九六〇年；第二阶段，全球化时期，经历了一九六〇年到二〇〇〇年四十年时间；第三阶段，突变时期，这将是最关键的十年，这个复杂的巨系统很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越过临界点，跌入混沌状态；那么，第四个阶段，“末日境况”就将接踵而至，或者是大瓦解、大破坏、大灾难，或者，是大跃迁、大突破、大转变（macroshift），跃迁、转变进入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文明。——连如此确定的时间表都已经列出，看来我们不能不把它当作一种“科学的”预言了。幸好人类社会已经多次领教过种种“科学的”预言——远有居维叶的“灾变论”，近有反修论战中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革命形势的预言——已经有了相当的心理承受力，否则，岂不又得因了一个新的末日预言而惶惶不可终日？

然而，不管拉兹洛的论断性预言有几分危言耸听，世界已经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节点上恐怕是事实，而且，这一个过程其实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对于人类的科学进步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危机和危险，有识之士早有预言，早有警告。看了拉兹洛的书，我不由地想起了当年玻恩在他的回忆录《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中所作的警告。这本书一九六八年在纽约出版，一九七九年就已经有了中译本。然而当时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既没有炒作，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今天来重温一下玻恩这本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书中的观点，或者重温一下爱因斯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警告，我们就会发现，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人类什么警告也没听进去，什么教训也没有记取，似乎已经我行我素地走到了自取灭亡的边缘了。

我们先来谈谈玻恩这个人。

麦克斯·玻恩是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德国犹太人，一八八二年出生于德国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一九七〇年逝世于哥廷根。在纳粹当政时期，他被迫离开德国，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直到退休后才于一九五三年重返故土。他在物理学上的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量子力学的波函数的统计解释，这是他在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原子动力学问题》一书中首先提出的。用玻恩自己谦虚的话说，“这是关于量子力学的第一本书”，“只是我们理解原子物理学中粒子和波的关系的第一步。对澄清这

种思想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定律和玻尔的互补原理。”时隔二十八年后，他为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自己对此的评论是：“一九五四年我荣膺诺贝尔奖的那些工作，未曾包含某种新的自然现象的发现，而是对观察自然现象的新方法的论证。”他的话里，既体现着一种不事张扬的求实的谦虚态度，又表达了他对自己的工作在思想方法方面的意义的重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相当重视哲学思维、重视对科学与社会人类的总体关系进行思考的科学家。他认为，“每一个现代科学家，特别是每一个理论物理学家，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同哲学思维交织在一起的，要是哲学文献没有充分的知识，他们的工作就会是无效的。”而他这种“对哲学文献”的“充分的知识”，显然不是我们许多科学家所习惯的那种把一切都往几个条条上靠的“哲学思维”。他一生都坚持着这种思想，以一种哲学家的智慧，对科学和社会进行观察和批判性的思考。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这个特点，既得益于他在理性、宽松、“科学气氛很浓的有教养的家庭里”成长的经历，得益于他在文学、艺术、音乐和其他学科（如天文学）方面广泛的爱好，也得益于对他的思想形成起着影响的那些良师益友。比如，玻恩自己就深情回忆过早年与希尔伯特和闵可夫斯基的交往：这两位伟大数学家观察世界的方式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从他们那里不仅学到了那时最先进的数学，并且还学到了一种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社会和国家的传统制度的批判态度，这是我一生始终都保持着的”。这种清醒的理性精神，我们还可从玻恩叙述的希尔伯特的一件事中看出来。有一次，有人议论到伽利略在受教会法庭审讯时没有坚持他的信念，希尔伯特相当激烈地回答道：“但他不是一个白痴。只有白痴才能相信，科学真理需要殉难；殉难在宗教里也许是必要的，但是科学的结果在适当的时机自会得到证明。”对于听惯了对伽利略、布鲁诺等人的殉难精神的种种颂扬的我们，希尔伯特的话也许应该成为发人深省的清醒剂。科学需要理性，也需要牺牲精神，所以，马克思才引用但丁的诗句来形容：在科学门口，就像在地狱门口一样，在这里，一切恐惧都必须消除，一切疑虑都必须抛弃。然而，这种为科学牺牲的精神是把科学当作一种信仰，一种献身理想，它固然无可非议，但

是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促进科学日积月累地前进的，还是理性，是理智而冷静的思考和研究工作，而不是也不应该每时每刻都是牺牲和殉道精神。革命和宗教都需要殉道，或许任何信仰都是这样，如果只把科学当作信仰，也是这样；但是，科学首先不是信仰，而是理性，是思想方法，甚至于是技艺——是技术和艺术。这么看，或许将有助于遏止或克服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愈演愈烈的对于科学的过分的崇拜和迷信，提防科学的僭妄。

正是以这样一种清醒的理性态度和批判精神，使他对近代以来科学的高度发展和科技进步于人类前景的影响，不会像我们那样始终如一地抱着一种简单天真的乐观态度，而是经常陷于一种充满忧思的批判思考之中。对于科学和人类社会按目前的轨道和模式继续发展的前景，玻恩是悲观的，他在这个路向上所看到的未来是阴郁黑暗的。二十年代初在中国的科玄论战中，梁任公、张君勱等人对科学和文明在欧洲的前景也曾有过类似的评论。但是由于他们都不是科学家，而是人文学者，是“国学大师”，所以他们对科学的质疑被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同胞们当成了反对进步的保守主义，当成了“玄学鬼”的梦呓。然而当同样的话，出自玻恩这么一位大科学家之口时，它就有了另外一层意味了。

作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玻恩热爱科学工作，认为科学既给了他职业和生活上“一切可能的满足和愉快”，也给了他一种心智上的愉快：“它像艺术一样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充满乐趣”，这种乐趣就在于体会到洞察自然界的奥秘，发现创造的秘密，并为这个混乱的世界的某一部分带来某种情理和秩序。这“是一种哲学上的乐事”。但尽管如此，当他看到“科学已经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和最重要的部分……科学在我们这个技术时代，具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作用，不管一个人自己的工作离技术上的应用有多么远，它总是决定人类命运的行动和决心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时，他就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职业”产生了沉重感。尤其是广岛的原子弹更迫使科学家们思考科学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这个问题。在其回忆录中的《见解》这一章中，玻恩充分表达了他的忧思。他说，当他想到科学要把人类“引向哪里”这个问题时，思考的结果是“令人抑郁”的。他相当悲观：“在我看来，自然界所做的在

这个地球上产生一种能思维的动物的尝试，也许已经失败了。其理由不仅在于核战争也许会爆发，毁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即使这样一场浩劫可以避免，对于人类来说，除了黑暗的未来以外，我什么也看不到。”人类历史已有几千年了，这部历史似乎丰富多彩、激励人心，实则千篇一律，“那就是和平与战争，建设与破坏，发展与衰落的交替。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有某些由哲学家发展的基本科学，和某些实际上不依赖于科学而掌握在技工手里的原始技术”。这两者的发展一直很缓慢，但三百年前却突然加速，并互相结合，产生了现代科技。其后的发展急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问题在于，“这种改变虽然是由精神造成的，却不受精神的控制”。它的后果谁也没能料到：“医学战胜了瘟疫和疾病，延长了人的寿命，却出现了灾难性的人口过剩；都市化传播了文明，却破坏了自然的生态；汽车使交通便利了，但废气却污染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层；通讯和交通的发达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其结果是，这世界的角落里第一个小小的危机，都会影响到其余所有的角落，并且使合理的政治成为不可能了。”即使把这都看作是可以行政和技术上的补救办法来纠正的科技的“误用”，那也还有更大的问题：“真正的痼疾更为深刻。这种痼疾就在于所有伦理原则的崩溃，从前即使在残酷的战争和大规模的破坏时期，这些原则也为在历史进程中进化并保持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方式。”这种传统伦理因技术而瓦解的情况，在和平时期就表现为，“机器和自动化已经贬低了人的工作并摧毁了这种工作的尊严……工作的目的和报酬是金钱”，人沦为了金钱的奴隶；而“在战争时期，体力和勇气，对战败了的敌人的宽大，对没有防御能力者的同情，昔日是模范战士的特征。现在这些东西什么也没剩下了。现代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没有为伦理上的约束留下余地，并且已使士兵沦为有技术的屠杀者”。而“这种伦理上的贬值是由于人类的行动每经过漫长而复杂的道路才能达到其最终效果的缘故”，因此，每一环节上的行动者都无须为其视野以外的好坏的效果负责。无论是生产某一物件，还是掀按钮之后发生在远方的大屠杀，还是把人送进毒气室。这样，“使我们的伦理规范适应于我们这个技术时代的形势的一切尝试都已经失败了”。传统道德观的代表和教会找不出补救办法，极权国家也“只是抛弃了对每个人都适用的伦理规范的观点”。

念，而代之以国家法就代表道德规范这个原则”。

玻恩对历史发展的这个陈述确实是令人心忧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有两个：“合理的政治成为不可能”和“所有伦理原则的崩溃”，这两条对人类的未来是危险的。前者，意味着在地球任何一偏远角落发生的不负责任行为都可能被现代科技和资讯放大为震撼全球的危机，从而干扰国际政治的正常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有人把“九一一事件”称为二十一世纪的开始实有道理。后者，“伦理原则的崩溃”，则意味着人们在终极层面上某种遵循和评判的根据的失落——这种伦理原则可能是出于敬畏，可能是出于理想主义，也可能是迫于强权，但终归，它制约着人们的为所欲为。而现代科技的发展，从精神和技术两方面彻底终结了伦理原则。这两种状况确实都是科技发达造成的物质和精神后果，而科学和技术现在对这种后果却无能为力。人类能指望用停留或倒退到过去时代的方法来维系伦理原则吗？能指望享受科学成果而躲避随之必然产生的问题吗？都不能。眼下欧洲有些城市搞起了“放慢脚步”的运动，那也只是他们在想“放慢”而已——在别处，这“小小环球”还是在“天地转，光阴迫”地加快脚步。于是今天的人类就陷进这样一种窘境：“还没有一个人想出过不借传统的伦理原则而能把社会保持在一起的手段，也没有想出过用科学中运用的合理方法来得出这些原则的手段。”因此人类在现代科技发展及其多种后果面前陷入困惑和危机感中是不可避免的事——困惑是精神的，而危机却常常是现实的。如果人类在其历史的继续发展中，在面对这种种危机时，靠理性、睿智和合作解决了这些问题，那就是一种幸运。只要在此之前人类不至于已被科学进步所毁灭，那么哪怕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伦理崩溃、价值失落的混乱和茫然，也还可以忍受。可是话说回来，除了一种同样茫然的乐观主义，谁也不能为这乐观前景提供论证和保证。

玻恩的思考更为悲观：“今天人类已经有了自我毁灭的方法——或者是在十足疯狂的一次发作中，例如在某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迅速的一击而自我毁灭，或者是由于草率地动用原子技术，通过人类遗传结构中的一个缓慢的毒化和退化过程而自我毁灭。”历史的发展，只有在加强着而没有减轻这种忧思。基因工程的进展已使克隆人成为可能，把它的意义与

原子弹问世相提并论似不过分。它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伦理道德和价值尊严上，都使人类立即面对严峻的考验。许多国家的政府已当即明令禁止将克隆技术用于人类，这在原子武器问世之初是没有的。人类毁灭自己和地球的能力是科学给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今，任何一个或者几个战争狂人和恐怖分子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运用科学技术威胁人类，而科学却没有同时逻辑地、自然地产生制约他们的力量，没有给人类拯救自己的能力。即使不说恶意的应用吧，从服务于人类需要来说，无论是原子能还是基因技术，能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也是明显的——人类社会及其决策者，谁愿意放弃那已经掌握的巨大物质力量，谁愿意失去从致命的疾病中拯救生命的可能？然而从长远来看，人类掌握了这种改变自然进程的力量的结果，却似乎可能更多地是拯救个体，造益当下，而终将毁灭人类，毁灭未来。

正是从这种历史的宏观角度思考，作为科学家的玻恩却对科学感到一种近乎绝望的悲哀，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他说：“由于科学方法的发现所引起的人类文明的这种破裂也许是无法弥补的。这种思想时常萦绕在我脑际。虽然我热爱科学，但是我感到，科学同历史和传统的对立是如此严重，以至它不可能被我们的文明所吸收。我在我的一生中所目睹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恐怖以及道德的完全崩溃，也许不是短暂的社会弱点的症候，而是科学兴起的必然结果，而科学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的理智成就之一，如果是这样，那么人最终将不是一种自由的、负责的生物。如果人类没有被核战争所消灭，它就会退化成为一种处在独裁者暴政下的愚昧的没有发言权的生物，独裁者借助于机器和电子计算机来统治他们。”——“九一一”之后，连“民主”而非“独裁”的西方社会，都开始“借助于”高科技手段对社会进行监控，却由于人们对安全的渴望而听不到多少抗议的声音，这或可视为从某一方面证明了玻恩的预言。玻恩接着说，“如果我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么人类的命运就是人这个生物的素质的必然结果，在他身上混合着动物的本能和理智的力量”。在现代文明成果如此繁荣昌盛的背景下，玻恩这灰暗的前景预言也许人们不能同意，但科学进步已经在其辉煌的外观下隐约向人类宣示着某种不祥。无论是原子能还是克隆技术，谁也无法否认其潜在的巨大危险。人类的理

性并非不足以认识这些危险，但却还总有别的原因使人类并非都遵循理性行事，这就是使玻恩这样的科学家对人类本性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原因。那么，人类的前景是否真的如此黯淡，人类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玻恩认为还有两个希望：一是现代科学所带给人们的新的思想方法，一是人类的理性和道德伦理原则所呼唤的世界和平。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分裂，以及科学发展和政治之间的分裂对人类是危险的，对科学的无知和出于利益对科学的滥用是灾难之源。因此人们理解现代科学，尤其是原子物理学所造成的思想方法变革是重要的。玻恩认为，“原子物理学教给我们的，不仅是关于这个物质的世界，而且还有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它给了我们一种认识论上的教训，当适当地加以解释时，这一教训就成为一种哲学，一种生活学说”，甚至适用于政治社会的领域，这就是量子力学中的互补原理。在原子结构的层次上，牛顿的古典力学失效了，适用的是量子力学的规律，而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定律和玻尔提出的互补原理。它们在原子物理学的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从玻尔到玻恩等人还由此引申出一种“互补性的哲学”——即“在人类思维的许多领域中，同一事实可能从不同的、但是互补的方面来了解”，以此防止思想和政治上的独裁专制倾向；玻尔甚至曾更明确地说：“根据自己的民族传统去理解其他民族的传统是困难的；为此就需要把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互补的。”这句话道出了玻尔、玻恩他们把互补原则推广到政治、社会、国际关系领域的真义所在。然而，这种从物理学到政治学的直接推导推得过去吗？

人类在面临着危机和希望——即“人类自我毁灭的威胁和建立人间天堂的希望”——之时，能把它从毁灭中拯救的唯一希望在于“人类的一个古老梦想——世界和平”。由玻恩和爱因斯坦、罗素等数十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曾经共同签署了一个宣言——“梅瑙声明”，提出要求持久和平的主张。那时，他们就已经“危言耸听”地断言：“时间已经不多了”，“一切取决于我们这代人根据新的事实来重新调整自己思想的能力。如果不能这样做，地球上的文明生活的时期就要结束”，“人类只有永远放弃使用武力才能得救”——半个世纪过去了，“已经不多”的时间还剩下多少？整个冷战时期，强国之间由于对核灾难的认识而达成了一种威